

Y1-17

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

北镇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系

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转化和发展

- 对五四文学革命起点和性质争议
的意见……………李崇葵 (1)

鲁迅研究史上光辉的一页

- 读《新华日报》鲁迅纪念与鲁迅
研究文章札记……………崔石岗 (22)

浅谈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李百川 (49)

也谈典型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 兼与李先锋同志商榷……………武守杰 (60)

文学应凝聚着作家的深沉理性……………郭德强 (73)

谈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曹家梯 (91)

《聊斋志异》的立异管窥……………刘觉民 (101)

剔除糟粕，吸收精华

- 读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孙保华 (120)

漫谈“夸张”

- 读《文心雕龙·夸饰》篇……门立功 (133)

《红楼梦》注释质疑……………刘凯鸣 (145)

试论篇章图解教学法……………郭志贤 (159)

试论“不但（不仅）”“而且”相呼应

- 连接相同句子成分的功能……………晋家泉 (178)

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 转化与发展

——对五四文学革命起点和性质争议的意见

李 崇 葵

五四文学革命何时开始？什么性质？历来就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由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由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运动。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某些参与者有这种看法，胡适自己欣然领受，曾自嘘什么“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①。以后的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开始的，并说陈独秀“初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②，这时：“虽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基本上已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了。”^③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以“阶级性质”划线，把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份以后，强调只有从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开始的，《新青年》进一步号召的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五四文学革命^④。这样，前一段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倡导都被划到五四文学革命的范围外去了。由于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起点和性质的争议，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一段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很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本文想通过五四文学革命发展过程的考察，谈谈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以此就教于对此问题深有研究的同志们。

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吹响了反对旧道德，提倡科学和民主，进行新文化运动的进军号。差不多同时，五四文学革命开始酝酿。酝酿阶段的特点是，一些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在他们的某些文章和彼此来往书信中，各自从不同角度表示对封建文学不满，表达了要立志进行革命的愿望。陈独秀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⑤。指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⑥，李大钊面对“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的状况，殷切希望海内青年闻风而起，而他自己也“甚愿执鞭以从之”⑦。但不管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还没有提出较为完整的文学革命理论，也没有提出如何进行革命的具体意见。此时，胡适表现相当积极。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写诗说：“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⑧。其后，多次表示这类似的愿望，还于一九一六年十月在“致独秀信”中提出“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⑨的意见。这个意见，虽较为具体，但还没有把文学革命作为一面旗子举起来。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义旗”；二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对胡适进行了

“声援”，文学革命进入了倡导阶段。

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并提，并把它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在许多同志那里是通不过的，因为，《文学改良刍议》是被斥为“形式主义改良”的，而且，胡适曾发表过自吹为文学革命领导的言论，肯定了《文学改良刍议》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之首，就有承认胡适是文学革命领导的嫌疑。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待历史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将其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给以历史的评价。我们不能重蹈“十年浩劫”中那种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的复辙。首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是客观的，是当时许多文学革命参与者都承认的。陈独秀公开声明他的《文学革命论》是“声援”胡适的。刘半农说“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同之而后”，他也“绝端表示同意”⑩。傅斯年也说中国文学革新“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⑪。对于当时情况，我相信当事人比我们后来人更清楚。令人难解的是，许多当事人的意见竟被后来人根据某些现成的结论推倒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其次，《文学改良刍议》并非只是“形式主义改良”，也有内容方面的意见。所谓“改良”，在当时是和“革命”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⑫。胡适最初提出“八事”，分为“形式上之革命”和“精神上之革命”两部分，“形式上之革命”在前。当把“八事”重新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时，却把原“精神上之革命”的内容提到前边。提为首条的“须言之有物”的“物”，胡适明确指出“非在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它包括“情感”和“思想”两方面，要求应有“真挚的情

感”和“高远的思想”，“文学无此二物，便为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他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强调“不摹仿古人”，要“跟时代而变迁”，“造今日之文学”；他斥那些仿古的所谓今之“文学大家”的作品毫无文学价值，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件‘逼真赝品’”，只有“实写今日社会之状”，才是“真正文学”。胡适要求青年“不作无病之呻吟”，指斥那些“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的诗文为“亡国之音”，期望今之文学家“奋发有为，服劳报国”^⑬。胡适的这些意见，在某些方面已触到了封建文学没落的本质，对封建文人所鼓吹的“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再次，《文学改良刍议》确实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形式”问题。但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文言这种僵死的语言形式，禁锢人们的思想，兜售封建毒素，抵制新文化思想传播的情况下，胡适大谈形式“改良”，并非全无意义。特别在《文学改良刍议》中首先亮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面旗子，对五四文学革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至于是否承认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绝不是以一篇文章就可论定的。众所周知，文学革命的酝酿和倡导，是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的。当时胡适身居国外，对文学革命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运动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新青年》编者掌握的。胡适只能应《新青年》编者之邀在《新青年》上发表意见，却无力左右运动的发展。在提倡白话文和尝试白话诗写作方面，胡适贡献大，时间早，堪称“发难者”，但“发难者”并不等于“领导者”；正象“先锋官”虽冲锋在前，但总要受“老师”指挥一样。因此，文学革命初期的领导者，是具有急进民主主义

思想的陈独秀等，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胡适。不承认胡适当时的贡献是错误的，把胡适捧上领导地位也是错误的。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的态度也表现得相当软弱。他是以与他人研究问题的态度提出问题的，他表示“容有矫枉过正之处”，“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⑭。试想，在封建文学势力很大，而且相当猖獗的时候，持这种态度“改良”是“改”不成的。再者，文中所谓“八事”，是从如何写文章的角度提出的，八条中只有三条与内容有关，其他诸条都是谈“形式”问题的。这些，都使文章的革命意义大大削弱。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态度坚定，言辞急进，矛头直指封建文学。文章“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大主义彻底否定了“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给要建设的新文学提出了构思应及“宇宙”“人生”“社会”的任务。特别是他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陈独秀“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⑮，表现出了他那急进的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然而，陈独秀也只能笼统地来谈论建设“国民文

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问题。这样的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建立起来,文章却没有作出具体的答复。

继《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之后,《新青年》上又陆续发表了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响应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显示了倡导阶段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规迹。

总之,倡导阶段的五四文学革命,已经亮出了革命的旗子,打响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战斗。而且战斗一开始,队伍中的一些中坚分子就以坚定不移、压倒一切的气势,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文学及其代表“十八妖魔”,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当然,这场革命弱点也暴露出来。主要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主导思想还只能达到急进民主主义;用于反封建文学的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进化论,文学观念也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吸取而来的;对待文化遗产、采取了一概予以否定的形式主义态度等。所以,这阶段的文学革命只是停留在几个新人物之间的相互讨论上,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联系;也没有出现足以体现文学革命理论的新文学作品。这就决定了力量不足,斗争无力对封建文学触动不大。因此,从根本上说,倡导阶段的文学革命仍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有的同志就根据这一点,以一九一八年五月划线,把一九一七年一月开始的文学革命划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范围外。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之间,既有质的差别,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就其总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⑩关于五四文化革命,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

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⑦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贯串于文化革命的全过程，从“总体”上规定了这场运动的彻底反封建性，但并不区分不开文化革命的新旧两个阶段。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另一段话中找到依据。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⑧这里的“一般新人物”，很难说是专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恐怕是把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李大钊、陈独秀甚至胡适等都包括在内的。这里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也很难说是专指一九一八年五月以后文化革命所进行的内容。联系“很对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这些有分寸的字眼，我们可以断定，毛泽东同志也是从“总体”上把五四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看待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完整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是在彻底反封建的总目标下，旧因素逐渐消退新因素逐渐增长的除旧布新的渐变过程，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硬是在新旧交替的量变过程中划出一条分界线，不光把倡导阶段的文学革命划在了旧文学革命的范围中，也把已受新因素影响并开始转化的最初阶段划到了旧文学革命范围中；在创作中，不光把胡适的《尝试集》推出了新文学的范围，也把《新青年》四卷一号至四号发表的早期白话诗推出了文学的范围。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倡导阶段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是急进民主主义。急进民主主义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的那种不妥协的彻底反封

建精神，虽然本质上没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比起洪秀全、梁启超、严复以及当时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来毕竟有着新的战斗特色。因而在这种思想领导下的文学革命，没有象辛亥革命那样在发展中暴露出不可克服的弱点而失败，而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步转化了。这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并认真加以研究的。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新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文学革命，由于逐渐发生了领导思想的转化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上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到五四运动爆发基本完成。

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中国反动派极为恐慌。一方面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诬蔑十月革命是“暴乱”，中伤布尔什维克党为“洪水猛兽”，另一方面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严密封锁消息，阻止所谓“过激主义”的传播。但事实正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时代的“洪水”是阻挡不住的。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报纸都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的字样报道了这个消息。^⑩一九一八年二月间，关于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中国报纸上也有了反映。虽然由于反动派的封锁消息和造谣中伤、国际帝国主义通讯社的歪曲报道，给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和领导这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但急切探求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还是从这些歪曲报道中觉察到了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一九一八年三月，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以《劳动》命名的杂志。这家杂志以友好而欢迎的态度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说：“现在我们中

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②①}四月，这家杂志又发表文章说：“世界惊人的欧战，已打了好几年。俄罗斯惊人的革命，也闹得轰天震地。世界人士莫不瞩目关心，打听他的消息，研究他的结果。做官做宦的恐怕他们乱子闹大了，把自己的利禄势位，也保不住。大地主大富翁，又恐怕他们乱子闹大了，共产世界一旦实行，把自己欺诈剥夺所得的私产，化为乌有。所以都是票票危惧，然大势所趋，莫可如何。只有那些不幸的劳动家，天天盼望他们的革命，早早成功，早早普及，好大众共享平等的幸福，同过自由的日子。”^{②②}不管编者和作者属于什么政治派别，这些介绍就是今天看来也还是符合事实的。这说明，十月革命确实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对中国产生影响了。

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是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而为五四文学革命领导思想的转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也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发动的，领导思想的转化也是首先通过《新青年》编者内部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发展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实现的。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某些在外国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和部分同情革命的留学生，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区别开来，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论区别开来。所以并不真正理解。陈独秀也一样。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拒绝读者要求《新青年》介绍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

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②这说明陈独秀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认识却十分模糊，更无意接受。因此，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多大影响。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部分具有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才从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屡遭碰壁的教训中，从俄国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转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求，逐步建立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新青年》编者中最先觉悟者是李大钊。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地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严格加以区别，指出二者“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③这篇文章在中外敌人诬蔑十月革命的喧嚣声中发表，正确地宣传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可以说是李大钊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显兆”。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他依据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指出这次战争的结果，绝不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庶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在欧洲各国已经兴起的俄国式的革命，已经形成一股“滔滔滚滚的潮流”。这股潮流

“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此，他预示，“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赞扬和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欢呼，揭露了贪天之功据为已有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阴谋，初步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初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也在李大钊的某些文章中反映出来。这段时间，李大钊没有发表有关文学的专门论文，但他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已经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指出：“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而此精神又是“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④的结果。因此，他要求中国文学也要“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对中国革命发生促进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倡文学应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反对为少数剥削者压迫者服务，主张用“通俗的文学”代替“古典的文学”。^⑤这些都证实，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新文学阵营中已经出现了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学的性质也随之转化。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这个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先由《新青年》改组编辑部开始奠定基础，后在从事文学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改组了编辑部。编辑除陈独秀外，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都或先或后地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大家或

作诗或作文，相互配合，结束了文学革命倡导阶段的冷落局面。如从一九一六年起，胡适曾多次写信撰文鼓吹白话文，但在一九一七年底前成效不大，用白话写诗作文的仅是个别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也只有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进入一九一八年后，情况大变，钱玄同提议，《新青年》同人起而响应，用白话写诗作文蔚成风气。就连“不太喜欢做新诗”的鲁迅也“打打边鼓，凑凑热闹”，^{②⑥}做起白话诗来。翻看《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两卷十二期（四卷1—6号，五卷1—6号）目录，就出现了白话诗词约六十首（不包括用白话翻译的诗。）作者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俞平伯等。可见新文学阵营力量已相当可观，声势也大起来了。开始一个时期，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学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为树立对立面，壮大声势，新文学阵营不得不在自己人之间，演了一出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信列举文学革命种种罪状加以攻击，再由刘半农复信加以批驳的“双簧戏”。但后来文学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将封建复古派惊醒。他们预感到形势的不妙，便于一九一八年冬到一九一九年春集中全力对文学革命进行抵抗。他们在北京大学散布流言，诬蔑恐吓《新青年》编者；“文选派”刘师培、黄侃等创办《国故》月刊，反对新文学；“桐城派”林纾写《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章，攻击新文学“覆孔孟，铲伦常”，宣称“拼我残年，极力维道”，更于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图依靠封建军阀的武力实行镇压。新文学阵营给予坚决反击。《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击了封建复古派的攻击，公开提出拥护“德

莫克拉西”和“赛因斯”的口号，表示坚决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大钊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四至五日《晨报》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妄图借军阀之手实行武力镇压的阴谋，表示不怕“那伟丈夫的摧残”，坚决斗争到底。此后，新文学阵营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击文章，彻底揭露了复古派的卑劣手段和阴谋，给了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由于封建复古派的倒行逆施，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通过这场战斗，刚刚形成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经受了锻炼，宣示了威力。

十月革命影响的另一结果，是一批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的出现。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方面开始于白话诗。这些诗，除胡适的最初几首“尝试”之作外，绝大部分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象《相隔一层纸》、《学徒苦》等一类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了黑暗社会阶级对立的作品，代表着这些作品的主流。当然，这些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还显得幼稚。因而便被一种以《狂人日记》发表时间划线的理论推到旧文学中去了。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每个时代的作品总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解放受苦难的劳苦大众，成了时代的强音。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民，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灾难尤为深重。所以，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对中国人民有着更强烈的吸引力。尽管反动派想方设法加以封锁，但总没有封锁住。当时，一些有志于社会改革的新文学作家，不可能对这个震撼世界的大变革毫无感触。他们面对现

实，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人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的抨击和揭露，熔铸成作品的新主题，已经触及到社会改造的重大课题。因此，初期白话诗应是新文学作品。事实上，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几乎都将这部分作品选了进去。可见，这部分作品已经被当作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的成果，并得到了现代文学工作者的较普遍的承认。

鲁迅对文学革命开始“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他转变态度，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调，做“遵命文学”的时间恰好也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以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于五月刊登在《新青年》上。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向几千年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它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带有里程碑性的作品，把它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方面达到的划时代水平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但把它看作是与初期白话诗的新旧质的差别的分界线就不恰当了。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的作品。同时，

《新青年》在新辟的“随感录”“什么话”专栏里，登载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抨击封建文化思想的杂文。这类作品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比作“曙光”，告诉人们二十世纪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②①，号召人民“抬起头”看“在头上”的曙光②②，给了很好的回答。这便说明，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与新的时代条件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总之，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文学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五四文学革命基本完成了领导思想的转化，并以其彻底地不